

生活与命运

上

[苏]瓦·格罗斯曼 著



生命 与 生活 运 (上)

[苏]瓦·格罗斯曼著 翁本泽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В. Гроссман

ЖИЗНЬ И СУДЬБА

本书根据《Октябрь》1988年1—4期

莫斯科版译出

生活与命运

[苏] 瓦·格罗斯曼 著

翁本泽 陆黎明 译
冯增义 曹国维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丹徒人民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1.625 插页 6 字数 701,000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 4,000 套

ISBN7-5327-1928-9/1·554

定 价: 17.05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第一 部

1

大地上一片雾茫茫。公路旁的高压电线上，泛着汽车前灯的反光。

没有下过雨，然而黎明时的地面却是湿的，因而当禁止通行的信号灯一亮，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就会隐隐约约地出现红色的光斑。在好多公里之外就令人感到集中营的气息——密密麻麻的电线、公路和铁路线都朝这一方向延伸。这是一个火柴盒似的牢房一排排整齐排列的区域，牢房之间形成一条条笔直的通道，上面是秋季的天空，地面上大雾迷漫。

远方隐约的警报声一阵紧似一阵。

公路紧挨着铁路，满载水泥的汽车队和长得惊人的货车几乎以同样的速度并排行驶了好一阵子。穿军大衣的司机们没有朝列车车厢和车上苍白的面孔看上一眼。

集中营的轮廓——拉在水泥桩上成排的铁丝网——从雾幕中显露出来了。里面是一排排临时搭成的牢房，中间形成一条条笔直的通道。这清一色的牢房显示出这庞大集中营惨无人道的特性。

在数以百万计的俄国农舍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间分不出彼此的一模一样的房子。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是独一无二的。要让两个人或两棵蔷薇完全相同，是不可思议的……在用暴力

消灭特性和个性的地方，生命就会消亡。

头发斑白的火车司机瞅着一晃而过的水泥桩子、装着旋转式探照灯的高塔架和混凝土炮楼，——炮楼里面挂着风灯，旋转式机枪旁站着卫兵。他向副司机眨了眨眼睛，机车发出了警告信号。点着电灯的扳道房、停在拦道木前的汽车和红色信号灯一闪而过。

远处传来迎面开来的列车的汽笛声。司机对副司机说：

“这是楚克尔，我一听见他那粗犷的嗓门就知道。他卸了车，正拉着空车去慕尼黑呢。”

这列空车隆隆地从开往集中营的列车旁开过去，被劈开的气流在震颤，车厢间的空隙一闪一闪地晃动着，过了片刻，空间和秋天的晨曦又和有节奏地奔驰的路基融合了。

副司机从口袋里掏出一面小镜子，照了照满是油污的面孔。司机伸手把他的小镜子要了过去。

副司机激动地说：

“唉，阿普费尔老兄，要不是搞什么车厢消毒，我们中午就能回去，不致拖到凌晨四点，搞得筋疲力尽。好像这种消毒工作就不能在我们枢纽站搞似的。”

老司机对这样没完没了的谈论消毒，显得不耐烦了。

“拉长信号，”他说，“我们不是进备用线，而是直接开进卸货场。”

2

到了德国集中营里，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莫斯托夫斯科伊不得不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后第一次认真地运用自己的外语知识。战前，他住在列宁格勒，很少同外国人交谈。现

在他回想起侨居伦敦和瑞士的岁月，那时候他和革命家们在一起，用多种欧洲语言交谈、辩论、唱歌。

睡在他旁边床上的意大利神父加尔第对莫斯科伊说，关在集中营里的有五十六个民族的人。

命运，脸色，服装，沉重的步子，大头菜汤和俄国犯人称为“鱼眼”的人造西米汤，——关在集中营里数万名囚犯的这一切都是相同的。

管理部门对关在集中营里的人的识别标志是号码和缝在衣服上布条的颜色：红的是政治犯，黑的是怠工者，绿的是盗窃犯和杀人犯。

人们彼此言语不通，但是共同的遭遇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了。分子物理学家和古文物专家同目不识丁的意大利农民和克罗地亚牧民住在同一间牢房里。当年养尊处优、胃口稍有不妥就会使女管家手足无措的人和终日劳碌不得温饱者一起穿着木拖鞋下地劳动，并且眼巴巴地张望着送饭的人——俄国犯人称他们为“科斯特利格”——是不是来了。

集中营里的犯人虽然来自各个阶层，但他们的命运是相似的。尘土飞扬的意大利大路旁的花园，北海阴森可怕的喧嚣，或者与博布鲁伊斯克郊区领导人员屋子里橙黄色灯罩有关的往事的回忆已成梦幻，——每个犯人都觉得自己的往昔生活是美好的。

进集中营前生活愈艰苦的人愈会吹牛。

这种吹牛没有具体的目的，它是在给自由唱赞歌：在集中营外面的人不可能是不幸的……

这个集中营战前叫做政治犯集中营。

国家社会主义创造了新型的政治犯——没有犯过罪的罪犯。

许多人因为在同友人交谈时抨击了希特勒制度，或者讲了几句有政治内容的笑话而被关进集中营。他们没有散布传单，没有参加地下党，但他们被指控为这一切他们都会干。

战争时期把战俘关进政治犯集中营，这是法西斯主义的杰作。关在这里的有在德国领空被击落的英美飞行员，有盖世太保很感兴趣的红军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盖世太保要求他们提供情报，在现成写好的各种声明上签字，乃至卖身投靠。

关在集中营里的还有试图擅自离开军事工厂和工程的消极怠工者。工作消极的工人被关进集中营，这也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新发明。

集中营里有衣服上缝着淡紫色布条的人，他们是从法西斯德国出走的德国侨民。从德国出走的人，不论他在国外是多么安分守己，也被定为政治敌人，这也是法西斯的新花招。

衣服上缝着绿色布条的是盗窃犯，他们是集中营里的特殊人物：管理当局利用他们监视政治犯。

利用刑事犯监视政治犯，这又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新绝招。

集中营关押着遭遇独特的人，他们的衣服上没有相应的布条。国家社会主义把耍蛇的印度人、从德黑兰来研究德国绘画的波斯人、物理专业的中国留学生也关进集中营，给他们喝烂菜汤，强迫他们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

列车日以继夜地开往死亡集中营。车轮声和机车的吼叫声不绝于耳，而且夹杂着数以万计的集中营犯人下地劳动的脚步声，每个犯人的衣服上都标着五位数的蓝色号码。集中营成了新欧洲的城市，这些有街道、广场、医院、旧货市场、焚化场和运动场的集中营在日益发展，规模越来越大。

建在市郊的古老监狱，同这些集中营城市相比，同焚尸炉上空冲天的红光相比，那就相形见绌了。

人们一定会认为要控制如此庞大的监狱机构，需要一支近百万人马的狱吏和看守大军。其实不然。穿党卫军制服的人往往几个星期不会走进牢房。在集中营城市里，犯人自行担负警戒任务，自行维持牢房里的秩序，把霉烂变质的土豆给自己下锅，把优质大土豆挑选出来送往军粮供应站。

在犯人医院和实验室里，医生、细菌学家和打扫院子的都是犯人，他们是提供光和热，提供苦役机器零件的工程师。

集中营里的一切事务，不论是日常工作还是夜间在牢房里发生的私事，都控制在残酷、卖力的集中营警察手中——左臂戴黄臂章的“卡波”，集中营看守和牢房看守。犯人容许参与集中营里的一些秘密事务，甚至可以编制“育种名单”，以及在禁闭室里殴打正在受侦讯的犯人。即使管理人员不在场，犯人也会给铁丝网通上高压电流，让大家老老实实劳动，不致逃跑。

这些“卡波”和牢房看守为集中营长官效劳，但又常常叹息，有时还为送往焚尸炉的人流泪……不过这种分化并不彻底，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列入育种名单。使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格外惶恐不安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并不是手持单片镜，目空一切，以与人们格格不入的姿态进入集中营的，而是合群地存在于集中营之中，他们并不和普通人相隔绝，而是以十分风趣的姿态出现，显得平易近人，他们对丧失自由的人们的语言、心理状态和思想活动都了如指掌。

3

八月的一个夜晚，莫斯托夫斯科伊、阿格里平娜·彼得罗芙娜、军医列维东和司机谢苗诺夫，在斯大林格勒郊区被德军俘虏后，被送往步兵师司令部。

阿格里平娜·彼得罗芙娜在审讯后就获释了，根据战地宪兵队工作人员的指示，翻译官给了她一只豌豆面包和两张三十卢布的红色纸币。谢苗诺夫被推进前往维尔加契田庄区营部的战俘队伍。莫斯托夫斯科伊和索菲娅·奥西波芙娜·列维东被送到了集团军司令部。

莫斯托夫斯科伊在那里最后一次见到了索菲娅·奥西波芙娜，——她站在满地尘土的院子里，头上没有戴帽子，肩章已被摘除，她那阴郁、愤恨的眼神和脸色，莫斯托夫斯科伊颇为赞赏。

在第三次审讯后，莫斯托夫斯科伊被赶到车站，那里一列车正在装运粮食。十节车厢满载着被遣送到德国当劳工的男女青年，在列车开动时，莫斯托夫斯科伊听见了女人们的叫喊声。他被关进硬席车厢的一个小房间。押送他的那名大兵并不粗暴，但在莫斯托夫斯科伊提出一些问题时，他的脸上毫无表情，似乎他唯一的职责就是押解莫斯托夫斯科伊。经验丰富的动物园工作人员，就是这样保持沉默、全神贯注地监视着关在笼子里、在铁路上旅行的动物的一举一动的。列车到了波兰总督管辖区，房间里多了一名旅客。他是波兰主教，头发斑白，眼神忧伤，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嘴唇像年轻人那样丰满。他一上车，就用带浓重波兰口音的俄语对莫斯托夫斯科伊讲起希特勒迫害波兰宗教界人士的事，但在莫斯托夫斯科伊对天主教和教皇作了一番谴责之后，他就保持沉默，对莫斯托夫斯科伊提出的问题，改用波兰语作三言两语的回答。过了几小时，到了波兹南，他被押下了车。

莫斯托夫斯科伊被送进集中营，经过柏林时绕道而行……在关押着盖世太保特别感兴趣的犯人的牢房里似乎已经过了好几年了。特种牢房里的生活比劳动营要好一些，然而这是被当

作动物进行试验的蒙难者们的轻松生活。有时值班会把某一个人叫到门口，原来他的一位朋友用烟草和他换一份口粮，这是有利的等价交换，于是这个人眉开眼笑地回到自己床边。另一个人也是这样给叫出去的，他中断了谈话，朝门口走去，后来就再也听不到他讲话的结尾了。第二天，“卡波”来到床边，吩咐值班把这个人的破衣烂衫收拾起来。接着就会有人厚着脸皮问看守凯泽，是不是可以让他睡这张空出来的床。粗野地谈论育种、焚化尸体和集中营足球队等乱七八糟的事，已成家常便饭。关于新式武器以及国家社会主义党头目内讧的小道消息，实在太多了，耳朵也听得起了茧。小道消息都是虚假的，但是听了令人舒服，它是集中营犯人的麻醉剂。

4

天快亮时下了一场雪，直到中午还没有融化。俄国人悲喜交集。这是来自俄罗斯的气息，在他们疲惫不堪的脚下的雪就像是祖国母亲的白色头巾，这雪把牢房的屋顶刷成了白色，远看就像是故乡的家园。

但是昙花一现的欢乐感和悲伤交织在一起，并在悲伤的怀抱中消逝了。

值班的西班牙士兵安德烈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用蹩脚的法语说，他的一位当文书的朋友看见了一份有关俄国老头的公文，但是还没有看完全文，办公室主任就把它拿走了。

“我的命运的答案就在这一纸公文上了。”莫斯托夫斯科伊想道，为自己如此泰然自若感到高兴。

“不过不要紧，”安德烈悄声细语地说，“还可以探听明白的。”

“向集中营司令官打听？”加尔第问道，他的一双大眼睛在半

明不暗中泛着黑色的闪光。“还是向保安总局代表利斯打听？”

加尔第白天和夜间表现截然不同，使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惊讶。白天，这位神父兴致勃勃地谈论菜汤，谈论集中营里新来的犯人，和同一牢房里的人交换口粮，回忆味辣多蒜的意大利食物。

红军战俘常常在集中营广场上遇见他，知道他爱说这样一句口头语：“统统完蛋”，因而老远看见他就大声招呼说：“巴德列大爷，统统完蛋，”然后微微一笑，好像这话能带来希望似的。他们以为“巴德列”是他的名字，所以就叫他巴德列大爷。

一天深夜，特种牢房里的苏联军官和政工人员打趣地问加尔第，是否切实信守独身生活的誓约。

加尔第严肃地倾听着法语、德语和俄语混杂的打趣。

等他们讲完后，加尔第谈了自己的见解，莫斯托夫斯科伊作了翻译。他说，既然俄国革命志士能为了理想去服苦役，甚至走上断头台，为什么他就不能为宗教信仰而终生不娶呢？这和牺牲性命完全是两码事。

“欸，可别这么说。”旅政委奥西波夫说。

晚上，当大家入睡后，加尔第就变成另一个人了：跪在床上祈祷。在他那狂热的眼睛里，在那鼓起的温柔的黑眼珠中，似乎可以藏匿这个苦役城的全部苦难。古铜色脖子上的青筋暴了起来，好像他在干什么重活，冷漠的脸上隐约露出阴沉、刚毅、幸福的神态。他祈祷了许久，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在这位意大利神父短促的喃喃声中进入了梦乡。当他一觉醒来（他通常睡上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就醒了），加尔第已经睡着了。意大利神父睡得很熟——打着鼾，咬着牙，很有滋味地吧哒着嘴唇，大声打着嗝，有时突然曼声地念上几句赞美上帝和圣母马利亚仁慈的祈祷文，——仿佛他在睡梦中把自己白昼和晚间的两种境界浑成

一体了。

他从来不会因为这位俄国老共产党员不信神而有所指责，常常向他打听苏维埃俄罗斯的情况。

意大利神父在听莫斯托夫斯科伊介绍苏联情况时，不断地点着头，好像对苏联政府封闭教堂和修道院，把主教公会的大片土地收归国有表示赞赏。

他那忧伤的黑眼睛望着俄国老共产党员，使得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生气地问道：

“我讲的话您明白吗？”^①

加尔第露出在谈论美味佳肴时所常有的那种微笑。

“您讲的我全明白，可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讲这些。”^②

关押在特种牢房里的俄国战俘不能免除劳动，因而莫斯托夫斯科伊只有晚间才能同他们见面和交谈。古济将军和旅政委奥西波夫不外出劳动。

经常同莫斯托夫斯科伊交谈的是一个很难判断多大年纪的怪人伊孔尼科夫-莫尔日。他睡在牢房里最差的地方——刮着寒冷的穿堂风，放着大马桶的门旁。

俄国犯人叫伊孔尼科夫“跳伞老头”，把他当作傻子，厌恶而又怜悯地对待他。他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忍耐力，这也就是只有疯子和白痴才会有的那种忍耐力。尽管他上床睡觉也不脱下给秋雨淋得精湿的衣服，可他从来不会伤风感冒。似乎只有疯子才会用如此响亮、爽朗的嗓门说话。

他和莫斯托夫斯科伊是这样相识的：伊孔尼科夫-莫尔日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面前，长时间默默地审视着他的面孔。

“有什么好消息吗，同志？”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问道。

① 原文为法语。

② 原文为法语。

“好消息？能有什么好消息？”伊孔尼科夫拖长声调说。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听了这话，不禁微微一笑。这两句话忽然把他带到了童年时代：从宗教学校回来的哥哥正在跟父亲作神学课程的争论。

“白胡子问题，”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佛教徒和早期基督徒早就考虑过了，马克思主义者也在致力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了吗？”伊孔尼科夫以使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可笑的语气问道。

“现在红军正在解决这个问题。”莫斯托夫斯科伊说。“恕我直言，在您的言语中含有某种精神安慰的东西，不知是宗教的还是托尔斯泰主义的。”

“这是必然的嘛，”伊孔尼科夫说，“因为我是托尔斯泰主义者。”

“真没想到。”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说。怪人使他感兴趣起来了。

“您要知道，”伊孔尼科夫说，“我深信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以后反教会的做法对基督教的思想是有益的，因为教会在革命面前成了可怜的阶层。”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温和地说：

“您简直是辩证论者。我在晚年得以看见福音奇迹，真是三生有幸。”

“不，”伊孔尼科夫皱起眉头说，“您的目的无非是证明你们所采取的手段是正确的，然而你们的手段是无情的。您在我身上看不到奇迹——我不是辩证论者。”

“原来如此，”莫斯托夫斯科伊忽然恼火地说，“可我到底能为您做些什么呢？”

伊孔尼科夫以军人的立正姿势站着说：

“请不要嘲笑我！”他的声音是凄惨的。“我并不是为了取笑而来找您的。去年九月十五日，我看见两万名犹太人——妇女、儿童和老人——被处死。这一天我明白，如果上帝确实存在的话，是决不容许发生类似事件的，于是我明白，上帝是不存在的。在今天的黑暗中我看见了你们的力量，它正在同可怕的正恶搏斗……”

“好吧，”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说，“咱们聊聊。”

伊孔尼科夫在集中营范围内的沼泽地带挖土和敷设混凝土水管，——排除使低洼地带变成沼泽的肮脏河水。在这一地带劳动的人叫“沼泽兵”^①，派到这儿来干活的往往是长官不喜欢的人。

伊孔尼科夫的手很小，手指很细，指甲也只有那么一丁点儿。他满面污泥、浑身精湿地从工地上回来，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床边，问道：

“允许我在您床边坐一会儿吗？”

他坐下来，面露笑容，一只手指着脑门，却没有朝对话者看一眼。他的脑门是异乎寻常的——不很大，向前突出，显得很光亮，好像它是脱离满是污泥的耳朵、古铜色的脖子和指甲断裂的手而单独存在似的。

经历单纯的苏联战俘们觉得他是一个难以捉摸、令人怀疑的人。

自从彼得大帝时代以来，伊孔尼科夫家祖祖辈辈都是神父，直到最后一代才走上另一条道路——根据父亲的愿望，伊孔尼科夫兄弟们所受的都是世俗教育。

伊孔尼科夫在彼得堡工学院求学期间，对托尔斯泰主义心向往之，就在最后一个学年中途辍学，到彼尔姆省北部当教师去

^① 原文为德语。

了。他在乡村里生活了将近八年，然后前往南方——敖德萨，到货轮上当了一名机舱钳工，到过印度、日本，后来在悉尼定居。革命后他回到俄国，加入农业社。这是他的宿愿，他相信农业共产主义劳动是通向人间天国的。

在集体化时期，他看见了满载被没收了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富农分子及其家属的列车。他看见疲惫不堪的人们在雪地上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他看见了家家户户的门窗全部钉上的没有人烟的村庄。他看见过一个被捕的农妇，这是一个脖子上青筋突起，有着一双晒得黝黑的勤劳的手，衣衫褴褛的妇女，押解兵惊恐地看着这个饿得发疯的女人生吞活剥地吃掉自己的两个孩子。

这一时期他开始公社里宣传福音教义，祷告上帝拯救亡灵，结果被关进监狱。原来是三十年代的灾难使他神志不清的。他在监狱精神病院经过一年的强制治疗后获释，迁居到了在白俄罗斯当生物教授的哥哥那里，在哥哥的帮助下被安排在科技图书馆工作，然而恐怖事件在他心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战争爆发，德寇占领了白俄罗斯，伊孔尼科夫目睹了战俘遭受的苦难，白俄罗斯城乡犹太人被处死的惨景。他又陷入歇斯底里状态，恳求人们藏匿犹太人，他自己也千方百计解救犹太妇女和儿童。不久他被人告密，然而又侥幸地逃过鬼门关，进了集中营。

这个衣衫褴褛、满身污泥的“跳伞者”头脑里一片混乱，他坚持荒诞不经的超阶级道德规范。

“凡是有暴力的地方，”伊孔尼科夫对莫斯科伊说，“就有痛苦，就要流血。我看见了农民的苦难，而集体化是为了幸福而进行的，可我不相信幸福，只相信善良。”

“照您这么说，将来人们为了幸福绞死希特勒和希姆莱，我